

# 当代西方女性批评与 女性文学的母性建构

李 芳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 要:**母性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以及女性作家如里奇、乔多罗、克里斯蒂娃、伊利格瑞、拉迪克、莫里森等,从不同角度聚焦母亲,对母性进行了全新建构。她们的母性建构大体上经历了抵制母亲身份的60年代、寻找母性力量的70年代、转向身体与伦理的80年代、走向多声部的90年代这四个阶段。百花齐放的女性理论与女性书写赋予了母亲自己的话语,使21世纪的母亲形象异彩纷呈,得以成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

**关键词:**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者;母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2-0147-08

母亲身份迄今为止仍是大多数女性所承担的角色,也关联着所有人的生命。但母亲身份对女性的独立与自我发展到底有何意义?母性究竟指向何处?女性等同于母性吗?母性带给女性的究竟是力量还是束缚?这些问题是女性主义思潮发展中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当代女作家书写中的母性重构动向,开始参与到母性的讨论中。蒋海新聚焦于当代中国女性作品中对“天然母性的挑战”,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天然”母爱的宣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束缚女性的意识形态建构”<sup>[1]</sup>;余竹平关注到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作家在母性书写中的日常化意识,指出“父权文化删减了母性丰富的人性内涵”,因而缺少“母性基本原则和范式的建立,和对母性生命的追问”<sup>[2]</sup>;杨莉馨在分析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中的母性主题时发现“对母爱的讴歌更多地被对传统母性的反思与拆解所取代”<sup>[3]</sup>。纵观大陆学界,母性仍然是一个边缘话题,往往停留在传统的“伟大”“无私”“无我”的模式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对母性话语的解读还很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而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方面大批女作家以自己独特的书写为母性的内涵掀开了新的篇章,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围绕母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打破了传统的父权文化对母性的规约,开启了女性自己的母性建构之旅。

## 一、抵制母亲身份的60年代

西方女性主义者对母性的建构之旅源于这样一个困惑:母性带给女性的究竟是桎梏还是力量?发表于1949年的《第二性》成为这一问题的导火索。该书1953年译成英文,为美国女性运动的第

收稿日期:2015-03-25

作者简介:李芳,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当代美国女性小说中的母性伦理思想”(2015M570757),项目负责人:李芳;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女性话语的重要转向研究”(SWU1409355),项目负责人:李芳。

二次浪潮注入了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激发了女性对婚姻、家庭、母亲身份等与女性命运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波伏娃在该书中从文化、生理等角度剖析女性受压迫的从属地位,强调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社会建构性。她指出母亲身份是女性受压迫的深刻根源,是女性无法作为独立主体存在的根本原因,“女人的卑微地位源于她们被迫过着重复性的生活,而男人为了过上更为重要的而非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生活,炮制出各种理由让女性受到母性的桎梏,使她们的处境代代延续”<sup>[4]</sup>。波伏娃的消极观点以及她本人身体力行对母亲身份的摒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女性六七十年代对母亲身份的理解。在《第二性》英译本发表十年之后的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继承了波伏娃的核心思想,被称为“《第二性》的私生子”<sup>[5]</sup>,是美国版的《第二性》,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标志性著作。《女性的奥秘》紧紧把握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受困于家中的“无名的烦恼”,从各种媒体及消费主义思想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出发,剖析了女性无法施展自我、无从实现自我的困惑。同波伏娃一样,弗里丹强调成为母亲并非女人的天职,她在书中呼吁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走出家庭寻找母亲身份之外的自我。这一时期被称为“反母亲”年代,许多女性拒绝成为母亲,批评现有家庭制度<sup>①</sup>。美国著名自白派诗人、小说家普拉斯1963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尤为深刻地再现了这一反母亲情结,主人公格林伍德极具创作才能,而她的母亲却极尽所能把她推向为妻为母的道路,她因此对母亲充满憎恨,在极度抑郁中进入精神病院。现实中的普拉斯本人在小说出版后不久,即舍弃年幼的一双儿女自杀身亡。拒绝母亲身份的普拉斯不仅以其文学作品,更以其生命书写了一曲“反母亲”悲歌。

同一时期,朱利尔特·米歇尔(Juliet Mitchell)在《女性:最长的革命》(1966)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母亲身份,认为女性生养孩子的劳动无异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异化劳动,甚至更加糟糕,因为孩子的所作所为对母亲的自主性造成了极大的危险:“如果生育能力成为女性行为与创造性的替代,家成为男性放松的场所,女性将永远受困在自己的角色里,受困于被普遍认可的自然状态中。”<sup>[6]22</sup>她指出母性并不是导致母亲退出公共领域的决定性因素,“女性在繁衍后代中起的作用,……生孩子、抚养孩子、对家的维护——这些形成了女性天职的核心”<sup>[6]20</sup>,对传统家庭制度的认可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最终造成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米歇尔在该文最后甚至构想了一个极具容纳性的多元社会:“夫妇住在一起或者不住在一起,与孩子之间长期的联盟,单亲父母抚养孩子,由社会而非血缘父母照顾孩子,扩展的亲属团体,等等。”<sup>[6]36</sup>她认为要实现女性的解放就必须打破父权制下单一的家庭制度,使女性的天职趋于社会化。米歇尔从家庭制度的角度分析母亲的境遇,这对于21世纪多元家庭结构下的母亲身份提出了具有预见性的观点。

1970年,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出版《性的辩证法》,这是反母亲浪潮的集大成之作。该书被称为生理本质主义的代表作,充满了极端的反母亲思想。费尔斯通极其推崇波伏娃,认为“在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中,波伏娃思想最为全面、最为深刻,使女性主义与我们的文化中最好的思想得到结合”,该书题首注明“献给长久不衰的波伏娃”。费尔斯通强调生育功能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从性别差异这一生物性角度而不是经济基础角度来解释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并为之寻找解决方案。她强调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源于男性生理上的优势,女性要获得平等地位只能靠拒绝母亲身份或依赖于科技发展改变单纯由女性繁衍后代的方法:“孩子应该平等地由双方诞出,或者独立地由任何一方给予生命……;孩子完全依赖于母亲(反之亦然)的情况应该让位于短期地依赖于某个小群体,……生物性家庭的统治地位将被打破。”<sup>[7]</sup>作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鼓励女

<sup>①</sup> 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对家庭的抨击引起了许多女性的不满,认为太过极端。她本人在1981年出版的《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强调家庭作为女性主义前线的重要意义,并指出第二阶段的重要任务便是重新建构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走向平等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获得原本属于男人的工作,也不意味着将家庭主妇的受挫感替换为使男性早逝的中风或心脏病。”(Friedan, 1981: xxxiii)弗里丹认为女性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意味着对女性的自我及女性在关照他人中形成的价值观的认可。参看: FRIEDAN B. The Second Stage[M]. Boston: Harvard UP, 1981.

性通过拒绝生养孩子来摆脱生理上的劣势,从而最终摆脱受奴役的状态。这些观点让渴望拥有孩子、渴望成为母亲的女性感到不安,引起了诸多非议。费尔斯通的论说充满了对父权制度的不满以及对母亲力量的渴望,也由此促进了女性主义者向着寻找母性力量的方向前进。这些观点,对于18世纪以来“强调母性是女性的天职,教育的目的是使她们能够真正履行贤妻良母的社会职责”<sup>[8]</sup>的启蒙主义女权理论,形成了颠覆性的变革,开启了母性力量的新时代。

## 二、寻找母性力量的 70 年代

如果说以波伏娃和费尔斯通为代表的女性对母亲力量充满怀疑,那么1970年代两部重要的母性著作,即艾德里娜·里奇《生于女性:作为经验与制度的母亲身份》(1976)与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sup>[9]</sup>(1978),则使母亲身份展示出积极的面貌,使母性在成为女性力量之源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里奇从个人经历及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女性主义理论等角度审视母亲身份,将其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追溯其制度化过程。与波伏娃等试图向男性看齐从而获得与男性等同的力量不同,该书旨在探寻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独特身份,通过对母亲复杂情感的认可与对母亲人性的展示来接纳母亲的存在。安德里·欧瑞丽(Andrea O'Reilly)认为该书“为女性主义者在文学与理论上的母性叙事扫清了道路”<sup>[10]</sup>。里奇在该书1986年再版序言中指出,该书的撰写始于1972年,当时“似乎女性在其他领域遭受的贬损以及女性在证实其母性的有效性上受到的压力需要得到进一步探讨”<sup>[11]viii</sup>。里奇显然感受到了当时“母亲”饱受敌意的存在,力图摆脱投射在母亲生理上的阴影,从文化的角度促使母亲从父权制度下受压抑的身份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她在前言中强调“该书并非对家庭或母职的攻击(除非这一母职受到父权制度的定义与限制)”<sup>[11]14</sup>,而是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解释母亲身份的社会建构性,促使女性突破这种制度化的母性束缚,建构起女性主义的母职观。“摧毁这一制度并非要废除母亲身份”<sup>[11]280</sup>,这是里奇贯穿于书中的观点,也为之后的女性主义者提出了问题:如何使母亲身份成为抵抗父权制度的武器,成为力量之源?

南希·乔多罗随后在《母职的再生产》一书中,从精神分析角度运用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从性别分工不平等导致的母职与儿童心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讨论母职如何在各种社会历史文化力量作用下在女性身上代代复制。乔多罗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指出,“70年代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挑战生物决定性别的独裁论调”<sup>[9]xiii</sup>。她深入驳斥了女性承担母职为其天性的观点,强调“女性承担母职不是一成不变的跨文化的共性”,“女性的角色是历史的产物”<sup>[9]32</sup>，“角色训练、认同与强化都与某种性别角色的获得有关系”<sup>[9]33</sup>。在分析母亲角色社会建构性的同时,乔多罗用心理分析方法阐述了女性如何在担任母亲的过程中通过与孩子之间的动态关系,使女儿接替自己承担起母职,最终实现母职的再生产。母亲照料抚养女儿,女儿从母亲那里习得自己的母亲角色。乔多罗的核心观点是由母亲养大的男性绝不可能习得母亲的角色。她在后记中指出,如果两性共同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职责,两性照顾孩子的能力必然旗鼓相当。简言之,父亲也可以具有母性,母性是后天形成的。由此,她不仅深入阐释了女性如何成为母亲的过程,并指出改变旧的性别分工制度使男性开始肩负母职是结束男女之间不平等的重要途径。乔多罗的这一观点赋予了母性新的含义:母性不是女性独有的,任何人都可以具有母性。通过对母性内涵的扩展,母性的束缚性也就自然得到了消解,这无疑给母亲的未来展示了一个可观的前景。

在讨论母职的再生产过程中,乔多罗也从心理分析角度对母女之间相互认同的关系给予了深入阐述,正契合了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另一重要话题,即母女关系。华裔美籍女作家汤婷婷1976年出版的《女勇士》成为母女关系书写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对建立母女同盟的困境与必然性从种族文化角度进行探讨,成为美国众多高校的必读书目。与普拉斯《钟形罩》中母亲的失语不同,小说给予母亲话语权,母亲成为故事的讲述者,母女之间出现对话,最终女儿开始接着母亲的故事

讲述自己的故事,由此母亲力量得到了传递,母女同盟得到了实现。

南希·弗莱获(Nancy Friday)《我的母亲/我自己:女儿对身份的寻找》<sup>[12]</sup>是关注母女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文本。尽管该书充满了反女性主义的论调,激发起对母亲更多的憎恨与不满,似乎“相信我们会永远被困在盒子里,她所做的不过是劝我们去装扮这个盒子”<sup>[13]</sup>,但弗莱获肯定了母女之间的联系,强调母亲在女儿身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再现了女性主义者需要审视的矛盾、痛苦、欲望以及恐惧等情感”<sup>[14]</sup>。同一时期,塞恩·赫曼(Signe Hammer)的《女儿和母亲:母亲和女儿》<sup>[15]</sup>、朱迪斯·阿卡纳(Judith Arcana)《我们母亲的女儿》<sup>[16]</sup>通过大量采访,从社会现实角度讨论了母女关系中的问题。阿卡纳的著作对弗莱获书中体现的对母亲的敌意进行反击,极为勇敢地从不不同角度尝试突破母女之间的重重关隘,使女儿了解到母亲所受的压迫,从而学会接纳母亲,学会爱母亲,最终建立起母女之间应有的联系。阿卡纳对母女之间建立同盟关系的必然性的讨论,掀起了女性主义者建构母性谱系的热潮,为赋予母亲力量找到了一条极具可行性且意义重大的道路。

### 三、转向身体与伦理的 80 年代

80 年代许多美国女作家参与到对母亲身体的叙事中,引出了一系列有关母性的伦理问题。爱丽丝·沃克《紫色》(1982)、玛丽·戈登《男人与天使》(1985)、苏·米勒《好母亲》(1986)、莫里森《宠儿》(1987)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母性书写。这些小说对母亲的身体经历以及身体欲望不惜浓墨重彩进行描绘。其中最具争议的是米勒的《好母亲》,尽管米勒以极大的勇气对独自抚养四岁孩子的母亲安娜的身体欲望给予肯定,但小说结尾安娜却以不能胜任母职为由被剥夺了孩子的监护权。在无孔不入的父权文化中,安娜以妥协成为社会所期待的好母亲,这是让女性主义者沮丧的结局。因此,安·斯妮托(Ann Snitow)将这部小说于 1986 年的发表当作女性主义运动的最高峰<sup>[17]</sup>。在莫里森笔下,黑人母亲也在“为自由和尊严而战”<sup>[18]</sup>。《宠儿》中对于塞丝生育孩子与喂奶等独特经历的书写成为作为奴隶的母亲获得自由与尊严的重要宣言。

令人振奋的是,与五彩缤纷的母性身体书写相呼应,80 年代出现了一批试图回到母性空间从而赋予母亲身体语言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不同于乔多罗试图将男性拉入母亲阵容从而扩大母亲队伍的策略,以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西苏、露西·伊利格瑞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进行批评,聚焦于差异性而极力肯定母性的身体,并以此为阵地为母亲身份建构新的生存空间。在《恐怖的权力》中,克里斯蒂娃提出“贱斥”(abject)这一概念,认为遭贱斥的东西包括令人作呕的食物、排泄物、我们所恐惧的东西如死亡和尸体等,都是不可言说的<sup>①</sup>。她认为母亲的身体以其具有深不可测吞噬力的子宫在男性恐惧中成为遭受贱斥的核心,将母亲以“呕吐”的方式驱逐到父权的语言之外,成为父权制度谋杀母亲的一种方式。因此,将不可言说的说出来,意味着让贱斥物显现出来,让母亲成为获得语言的主体,这也是女性书写的重要内容。

露西·伊利格瑞吸收了福柯的话语观,把欲望与权力联系起来,认为身体是权力话语的产物。她一反弗洛伊德的弑父理论,指出“整个西方文化建立在谋杀母亲的基础上”<sup>[19]</sup>。“弑母”概念蕴含了两层意义:首先是作为主体的母亲的消亡,其次是与母亲的身体联系的断裂。在《非一之性》中,她用诗性语言歌颂女性身体,试图通过语言为女性建立起不依赖于男性的新身份。同美国 70 年代的母女联盟相呼应,她强调母女之间的联系以及女性之间的爱,推动了“母性谱系”的寻找与建立。在她对母性谱系的建构中,母亲的身体成为焦点:“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词汇、新的句子来表达母亲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之间最原始也最现代的关系。”<sup>[20]43</sup> 女性必须让自己“置于女性的谱系内才足以征服并保持自己的身份”<sup>[20]44</sup>,伊利格瑞认为西方哲学充斥着对差异性的恐惧与对同一性的追求,

<sup>①</sup> KRISTEVA J. Powers of horror.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2. 又,张新木在其译著《恐怖的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中将“abject”一词译作“卑贱”,本文考虑到该词所包含的动词含义,特选用“贱斥”一词。

与之相对,她强调性别之间的差异,认为“性别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也许能使我们得到拯救的问题”<sup>[21]</sup>。她用女性身体构造的独特性解释女性的愉悦,号召女性探寻“我们的性身份,我们的欲望、天然的情欲、自恋精神以及异性恋特征与同性恋特征等的独特性”<sup>[22]</sup>。伊利格瑞打破了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禁锢,以新的语言塑造女性的身体,为母亲的身份正名,为母亲成为独立主体而不受父权谋杀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苏(Hélène Cixous)与伊利格瑞一样强调“身体书写”,认为女性的书写是抵抗父权秩序的重要场地。她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写道:“书写你的自我。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唯有那时候你潜意识中无穷的资源才会奔涌而出。”<sup>[23]</sup>西苏认为女人体内都具有“母亲”的成分,“在她体内至少有那么点好母亲的奶液。她用乳白的奶汁书写”<sup>[23]</sup>。西苏将母性身体看作女性书写的源泉,不免使人质疑其观点中的本质主义倾向,但她着力建构的并非是传统文化中为维护父权制度而存在的伟大母性,而是与父权理想相抗衡的母性主体,是不依赖于象征界的符号而独立存在的主体。她强调女性用自己的语言书写自我,这是对女性独立性的宣告,对于构建母亲的身份提供了一个走向差异性的立足点。

对母亲身体的书写毫无疑问打破了传统的父权伦理对女性身体的束缚,使对母性的考察进入了女性主义伦理学的视界。女性主义刊物《西帕迪亚》(Hypatia)1986年秋季版以“母亲身份与性行为”为主题的专辑,对女性之间的友谊、边缘群体的性取向、性生活中的控制权、性别歧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性、生育技术发展对母亲身份的影响等,从政治、伦理、哲学等角度进行了讨论。当期主编安·弗格森(Ann Ferguson)提出了母亲身份与性行为的女性主义伦理观,认为寻找母亲身份与性行为的女性主义伦理观这一问题在当今美国的女性运动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sup>[24]</sup>。

从伦理角度介入到母性建构中,对于打破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无疑开启了一扇大门。1980年,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在《母性思维》中提出“母性思维”概念,将母亲个体的实践生活纳入母性思考的重要开端。安·斯妮托(Ann Snitow)认为萨拉·拉迪克这一概念是“继艾德里娜·里奇以来对于号召结束母亲书写禁忌的最完整的回应”<sup>[17]</sup>。萨拉·拉迪克讨论了“母性思维,即她所形成的智能力、她所作的判断、她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态度、她所确定的价值观”<sup>[25]</sup>,她认为母亲在“保全孩子的生命、促进孩子生长并接纳孩子”的“母性实践”中形成了母亲不同于主流文化的独有的价值观。萨拉·拉迪克将母职当作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承担的工作,寄希望于将男性纳入照料孩子的母性实践中,使他们获得“母性思维”,使“经过改造的母性思维进入公共领域,使保全所有的孩子、促进他们的成长成为公共良心与立法的工作”<sup>[25]</sup>。萨拉·拉迪克试图将母职与母亲身份分离开来,从而使母亲摆脱生理特征带来的束缚,这一思想在1980年代也许只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而随着越来越多替养母亲的出现及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已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美国的社会现实。1989年,萨拉·拉迪克出版《母性思维:通向和平的政治》,进一步提出了“母性政治”概念,认为由于母亲所从事的作为母亲的工作使她们不可能支持战争,因此她们注定会反对军事主义与战争。因此,萨拉·拉迪克强调“充满关爱与正义”<sup>[26]</sup>的母性政治,力图将母亲的工作与促进和平、消除暴力联系起来。

萨拉·拉迪克对母职这一工作独特性的讨论及其对关爱思想的关注,在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年的著作《不同的声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述。这一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的代表作从道德角度为母亲的主体寻找支撑点,提出了“关爱伦理”,认为女性自己的经历为“成人生活的核心真理提供了线索”<sup>[27]</sup><sup>172</sup>。吉利根强调客体关系,认为女性往往将自我置于各种关系中,通过对他人负责而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解决冲突。吉利根对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关注使女性主义伦理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普遍性与抽象性,成为基于情境的道德判断。同时,吉利根强调母职,认为母亲正是在承担关心他人、对他人负责的工作中形成了基于关系的价值观。同拉迪克一样,吉利根对母亲视角与母性经历的关注,使她被视为强调性别差异者,受到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

是,她削弱了现代道德理论的基础,通过性别来审视道德发展观,使女性视角与女性知识的合法性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人们确定伦理准则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并“频繁在法律论著中得到引用”,“有助于改善法律”<sup>[27]</sup><sup>1</sup>。吉利根的爱伦理思想引发了女性主义伦理的讨论。奈尔·诺丁(Nel Noddings)、弗吉尼亚·海尔德(Virginia Held)等认为“关爱”是基于女性经历而在女性关照他人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道德。伊里斯·马里森·扬格(Iris Marison Young)将“正义”放在社会建构框架下进行新的阐释,认为唯有从制度化的制约中解脱出来获得自决权和自我发展,才有真正的自由。

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反对性别差异思想的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巴特勒强调文化的建构性,用“表演性”概念来解释母性,认为母性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在《克里斯蒂娃的身体政治》<sup>[28]</sup>中,她对克里斯蒂娃的母性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认为她将母性身体建立在父权社会的律法之外,无助于女性的解放。她反对克里斯蒂娃将母性身体看作是承载文化产生之前的意义,认为这一观点实际上“维护了文化属于父权结构的思想,从而使母性受限于文化出现之前的现实状态”<sup>[29]</sup><sup>106</sup>。巴特勒忧心忡忡地指出:“一旦维护母亲身份这一制度的欲望被尊为前父权社会与前文化时期的驱动力,那么这一制度便在女性永恒的身体结构中获得了合法性。”<sup>[29]</sup><sup>117</sup>她坚信,要想颠覆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必须将女性的身体置于父亲的律法内,正视其文化建构性。巴特勒的这一思想暗示了母亲发挥能动性成为主体的可能,因为在母亲“行动”的过程中,母亲无疑具有扰乱父权社会主导话语的潜能。巴特勒对性别系统不稳定性的讨论,以及她试图颠覆性别差异的理论,对同性恋母亲如何在异性婚姻的体制中获得主体性带来了希望。此外,陶丽·莫伊(Toril Moi)提出了情境化的身体观,试图“从情境化身体角度考察女性的生存状态,使学者们得以逃离性别差异的桎梏,寻找新的出路”<sup>[30]</sup>。这一观点从身体的角度拓展了吉利根的情境论,对于从日常的角度理解母亲身体的存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窗口。

#### 四、走向多声部的 90 年代

在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新的母性呐喊之时,印第安女性、非裔、亚裔、拉美裔等各种边缘群体的母亲也开始发出声音。佩特里西亚·希尔·科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强调女性在建构母性思想时,不能无视“西方社会思潮的去境化”背景<sup>[31]</sup><sup>57</sup>,不能忽视种族与阶级的影响。她反对将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模式套在黑人家庭结构上,认为非裔母亲在三个方面与白人母亲区别开来:首先,黑人家庭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并非简单地对立为男性在外养家糊口、女性在家抚养孩子这一两极分化。科林斯认为对有色女性而言,工作和家庭是不可能对立的<sup>[32]</sup>,她用“母亲工作”(motherwork)一词来替代母职,试图“消解私人与公共空间、家庭与工作、个人与集体”等的对立<sup>[31]</sup><sup>59</sup>。第二,在黑人家庭里严格的性别角色分工并不常见。黑人母亲在家庭里的影响往往比男性更大。第三,好母亲必须呆在家里,使母亲成为全职工作,也绝不是黑人母亲的现实,因此,“冲突的焦点在家庭之外”,因为“母亲工作相信个人的生存、力量的获得和身份的实现与群体的生存、群体的力量和身份息息相关”<sup>[31]</sup><sup>59</sup>。尽管不可否认男性的统治地位对少数族裔女性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与种族歧视和经济压迫是紧密相连的。科林斯认为对母亲的神化是黑人母亲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这在黑人男性作家的书写中尤为突出,在不断称颂“伟大的黑人母亲”的同时,黑人男性无视她们在贫困中抚养孩子的挣扎,继续将不可承受之重委以她们,即便是在眼睁睁看着她们受尽苦难时,他们潜意识里的声音仍然是“这是一个伟大的姐妹”<sup>[33]</sup>。不同于中产阶级白人母亲,生存问题是印第安、拉美、亚裔、非裔等边缘群体母亲面临的首要问题,科林斯指出,在为孩子的生存而斗争的母职工作中,产生了许多矛盾冲突,比如母亲的“个人自主权的失去”,“个人的成长被群体利益的侵吞”,“母亲与孩子的分离”<sup>[31]</sup><sup>62-63</sup>等。科林斯将少数族裔母亲为获得母亲的力量进行的斗争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即选择做母亲的权力;二是保留自己的子女,不被迫与自己的子女分离的问题;三是不让自己的子女受主流群体的思想控制的权力<sup>[31]</sup><sup>56-74</sup>。

此外,母女关系与母性谱系的重新建立也是各种边缘群体女性的努力方向。印第安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的《死者年鉴》<sup>[34]</sup>、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灶神之妻》<sup>[35]</sup>、非裔作家艾丽丝·沃克的《拥有快乐的秘密》<sup>[36]</sup>等,都是这一时期来自少数族裔的重要的母性书写。“循着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对美的热爱与对力量的尊重这一遗产,我找到了我自己的花园”<sup>[37]</sup>,沃克的这一声音代表了许多少数族裔女儿的书写动向。1991年出版的《双重针脚》<sup>[38]</sup>一书记录了黑人母女对话的声音,从理论上再现了黑人母女关系的复杂性。总的来说,包括黑人母亲、印第安母亲在内的少数族裔母亲,从一开始就被看作力量的象征,她们的力量不仅仅源于家庭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她们对社区其他孩子的抚养,因此,替养母亲、社区母亲等非血亲关系的母亲也是她们的母性理论的重要议题。

## 五、结语:21 世纪的母性

从以上讨论中不难看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者从历史、文化、经济、心理、生理等角度对母性进行了全新建构。如果说60年代在“反母亲”浪潮中,母亲身份引发的主要是批评与抵抗意识,70年代以来学者们则倾向于更为积极地接受母亲身份,致力于寻找赋予母亲能量的方法。一方面,她们将母性的内涵扩大,使母性不再仅仅归属于生养孩子的女性,而是将包括男性在内的各种承担起母职的人囊括在内;另一方面,她们立足于差异性以及女性日常的生活实践,致力于母性谱系的寻找,并从女性主义伦理的角度为母亲如何摆脱传统的母性束缚而成为具有主体性的母亲出谋划策。布莱恩·辛普森(Brian Simpson)的《获得平衡的母亲:抚养孩子而不失去自我》<sup>[39]</sup>、艾米·理查德(Amy Richards)的《选择:有孩子但不失去自我》<sup>[40]</sup>、安德里·欧瑞丽(Andrea O'Reilly)的《不守法规的母亲:为母亲赋权的理论与实践》<sup>[41]</sup>及其论文集《女性主义的为母之道》<sup>[42]</sup>等,都体现了女性主义者试图改写父权制度下传统的母亲身份并以女性主义话语重新定义母亲、赋予母亲力量的努力。

在不断书写母亲的自我、为母亲寻找不依赖于孩子的存在时,女性主义学者们正视了父权制度下的各种阻力,如苏·兰希·维拉尼(Sue Lanci Villani)与简·E·瑞岩(Jane E. Ryan)合编的《十字路口的母亲身份:遭遇角色变化中的挑战》<sup>[43]</sup>,朱迪丝·沃纳(Judith Warner)的《百分百的疯癫:焦虑时代的母亲身份》<sup>[44]</sup>,对21世纪母亲面临的自主性威胁毫不乐观,提出了许多母亲们单靠自己的女性主义行动无法解决的问题。2006年,琼·布雷兹(Joan Blades)和克里斯汀·柔-菲克贝讷(Kristin Rowe-Finkbeiner)合作出版的《母亲宣言》<sup>[45]</sup>,被认为是与《女性的奥秘》一样影响了一代人的标志性著作。该书不再停留在感伤与愤怒的叙述中,而是从健康保险、带薪休假、早期学龄教育与孩子入托、儿童电视节目、灵活机制的工作安排等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讨论。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无疑是人类婚姻史上的大事件,将对传统婚姻模式下的母亲身份带来强大冲击。在将来,也许女性不再仅仅成为母亲的对等词,家庭性别分工也将逐渐模糊,母性书写必然呈现出别样的光芒。

### 参考文献:

- [1] 蒋海新. 话语与母性:一种文本叙事的颠覆[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67-72.
- [2] 余竹平. 日常叙事中的母性观照[J]. 小说评论,2011(4):75-78.
- [3] 杨莉馨. 女性主义与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母性主题的演变[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43-47.
- [4] DE BEAUVOIR S. The second sex[M]. PARSHLEY H M, trans & ed. London: Lowe and Brydone,1953:502.
- [5] DIJKSTRA S. Simone de beauvoir and betty friedan:the politics of omission[J]. Feminist Studies, 1980 (2,Summer):290-303.
- [6] MITCHEL J. Women:the longest revolution[M/OL]. [http://platus1917.org/wp-content/uploads/archive/rgroups/2008-09/mitche lljuliet\\_womenlongestrevolution\\_nlr40.Pdf](http://platus1917.org/wp-content/uploads/archive/rgroups/2008-09/mitche lljuliet_womenlongestrevolution_nlr40.Pdf),1966.
- [7] FIRESTONE S.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M]. New York:Bantam Books, 1970:7.
- [8] 吴攸. 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义思想[J]. 外国语,2014(3):1-6.
- [9] CHODOROW N.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M].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 [10] O'REILLY A, ed. From motherhood to mothering: the legacy of Adriene Rich's *Of Woman* [M].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4; 3.
- [11] RICH A.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M]. Ten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1986.
- [12] FRIDAY N. *My mother/my self: the daughter'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7.
- [13] VOORHEES S. Review of "My mother/my self: the daughter's search for identity" by Nancy Friday [J].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1978, 3(2, Summer): 75-77.
- [14] HIRSCH M. Mothers and daughters [J]. *Signs*, 1981, 7(1, Autumn): 200-222.
- [15] HAMMER S. *Daughters and mothers: mothers and daughters* [M].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76.
- [16] ARCANA J. *Our mother's daughters* [M]. Berkeley, CA. : Shameless Hussy Press, 1979.
- [17] SNITOW A. Feminism and motherhood: an American reading [J]. *Feminist Review*, 1992, 40(Spring): 32-51.
- [18] 张丽霞, 杨晓莲. 迷失·抗争·引导——解读莫里森笔下的黑人母亲形象 [J]. *外国语文*, 2014(5): 13-18.
- [19] IRIGARAY L. The bodily encounter with the mother [G] // WHITFORD M, ed. *The irigaray reader*. MACEY D, tran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1; 34-46.
- [20] IRIGARAY L.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M]. PORTER C, BURKE C, trans. Ithaca, N. Y. : Cornell UP, 1985.
- [21] IRIGARAY L.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M]. BURKE C, GILL G C, trans. Ithaca, N. Y. : Cornell UP, 1993; 5.
- [22] IRIGARAY L. The bodily encounter with the mother [G] // WHITFORD M, ed. *The irigaray reader*. MACEY D, tran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1; 34-46.
- [23] CIXOUS H, COHEN K, COHEN P.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J]. *Signs*, 1976, 1(4, Summer): 875-893.
- [24] FERGUSON A. Motherhood and sexuality: some feminist questions [J]. *Hypatia*, 1986, 1(2, Autumn): 3-22.
- [25] RUDDICK S. Maternal thinking [J]. *Feminist Studies*, 1980, 6(2, summer): 342-367.
- [26] RUDDICK S.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xxi.
- [27] GILLIGAN C.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2.
- [28] BUTLER J. The body politics of Julia Kristeva [J]. *Hypatia*, 1988, 3(3): 104-118.
- [29] BUTLER J. *Bodies that matter* [M]. New York: Roudedge, 1993.
- [30] 李芳. 从政治性到身体性: 陶丽·莫伊的女性主义思想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117-123.
- [31] COLLINS P H. Shifting the center: race, class and feminist theorizing about motherhood [G] // BASSIN D, HONEY M, et al, eds.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1994.
- [32] COLLINS P H. The meaning of motherhood in black culture and black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G] // BELL-SCOTT P, GUY-SHEFTALL B, etc. eds. *Double stitch: black women write about mothers and daughter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43-44.
- [33] COLLINS P H.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5.
- [34] SILKO L M. *Almanac of the dead*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 [35] TAN A. *The Kitchen God's wife* [M]. London: Famingo, 1992.
- [36] WALKER A. *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M]. San Diego(CA): Harcourt, 1992.
- [37] WALKER A.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G] // BELL-SCOTT P, GUY-SHEFTALL B, etc. eds. *Double stitch: black women write about mothers and daughter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205.
- [38] BELL-SCOTT P, GUY-SHEFTALL B, etc. eds. *Double stitch: black women write about mothers and daughters* [G].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 [39] SIMPSON B. *The balanced mom: raising your kids without losing your self* [M]. Oakland, CA. : 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 2006.
- [40] RICHARDS A. *Opting in: having a child without losing yourself*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 [41] O'REILLY A. *Mother outlaw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empowered mothering* [M]. Toronto, Ontario: Women's Press, 2004.
- [42] O'REILLY A, ed. *Feminist mothering* [M].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4.
- [43] VILLANI S L, RYAN J E. *Motherhood at the crossroad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a changing role* [M]. Boston, Mass. : Da Capo Press, 1997.
- [44] WARNER J. *Perfect madness: motherhood in the age of anxiety* [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6.
- [45] BLADES J, ROWE-FINKBEINER K. *The motherhood manifesto* [M].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6.